

《民族学与人类学方法论研究》述评

马 祯

主、客体对立的问题一直是人类学以及很多其他社会科学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始于社会科学建立之初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科,人类学从来都未停止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反思甚至否定。意大利米兰一比可卡大学人文科学与教育系教授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①中呈现了对主、客体对立问题的探究如何推动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即人类学如何通过反思自身研究方法,使其理论不断得到创新并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对认识论做出特有贡献。他巧妙地通过梳理人类学学科建立的哲学背景——建立在经验主义和理性知识基础之上的科学观念,以及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这一观念的反思,引出什么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马力罗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并不是对其发展的历时性回顾,而是对格尔茨人类学研究方法革新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反思的反思。因此,这本书是对反思的反思,对批判的批判。

这本书共分为导论和五个章节,呈现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如何从最初的问卷调查到纳入研究者身体主体性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哲学基础。作者在导论中论述了人类学通过反思其研究方法,将现代科学的困境,即主、客观的对立,变成方法和理论的双重资源的过程。五个章节按照时间顺序对人类学从诞生之初到后现代的方法论发展做了批判性回顾,并在回顾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研究者如何理解其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这两个主题展开论述。第一章勾勒了人类学研究方法如何从实地调查和理论分析的分离走向二者的统一;第二章通过呈现早期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而讨论人类学如何成为建立在精细化研究基础上的“直接知识”;第三章论述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田野调查方法革命及其在人类学理论上的贡献;第四章回顾格尔茨如何在结合人类学前辈的方法论和符号学、现象学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创新性推进。这一推进直接将人类学带入后现代及其反思中,它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研究者自身主体性的肯定。马力罗在第五章中对人类学方法如何引入研究者的身体进行了梳理和批判。本文将按照本书的主要线索对其重要观点做归纳述评。

一、从问卷调查到“直接知识”

在马林诺夫斯基确立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之前,人类学主要使用的调查方法是“问卷与统计”。虽然本书第一章的标题是“问卷与统计”,但马力罗并不是介绍如何使用问卷和统计方法

^①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

进行研究,而是深入阐述民族志和人类学在学科诞生之初的区别。在早期人类学传统中,民族志被认为是收集材料,而人类学是对材料的比较、分析和抽象化解释。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人类学之初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结果,实地调查被认为是中立、不干扰理论分析的行为。正是因为对于实地调查和人类学研究之间不同性质的理解,早期的人类学理论家和调查者是截然分开的,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群体。调查人员发放问卷收集信息,将其转交给理论分析家。实地调查和人类学之间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实地调查是特殊性的活动,比如在某个地方关注某个主题,只有人类学家通过理论概括最终将特殊知识一般性化。早期人类学家认为只有信息本身重要,如何收集、谁去收集信息并不重要。除此之外,马力罗在这一章还试图表明研究方法和理论之间互相印证和支撑的关系,如正是比较和数据统计的方法孕育了人类学早期的进化论和传播论。

19世纪末期,英国渐渐开始重视区域性系统化分析,人类学研究方法受之影响,形成了从分析二手资料到“直接知识”的方法论转变。与间接获得的二手资料相区别,马力罗将人类学家自己亲身收集、亲身验证而获得的材料称之为“直接知识”。这一方法论上的转变发生在两个背景之下:首先是殖民地的可进入性;其次是之前收集的资料已展现出原本被人类学家认为原始的社会事实上呈现出令人困惑的复杂性。^①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调查依然建立在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人类学家被认为是科学家,田野就像是实验室。同时,这一时期的人类学研究汇集了各个学科,并对某一地区的社会或人群进行“精细化”研究。马力罗详细呈现了法国的“人类观察者学会”和北美的内部研究法,认为在这一时期的知识收集已十分注重调查者在调查地的融入等问题。例如,法国的“人类观察者学会”提到在进行异文化研究时,要“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要入其乡、随其俗、学其语”。^②这与后来马林诺夫斯基所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已经十分类似。

马力罗认为,欧洲人类学对实地考察的重视对人类学的方法论发展做出了至少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对调查地点的确定,二是开始注意收集到的资料之间的联系。马力罗也强调了一个十分重要但被很多学者忽略的问题,即这时候的人类学作品越来越接近于著述而非呈交给博物馆的调查报告。^③在回顾美国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时,马力罗敏锐地看到与英国或更广泛的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的人类学不是建立在帝国扩张的基础上,而是对其国内定居点的调查。美国的人类学主要研究其本土的各种文化,其研究形式主要是人类学家长时间对被研究点进行多次频繁的访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博厄斯(Franz Boas)。博厄斯建立了人类学在特殊历史和社会环境塑造下的差异化场景性研究。他对具体性人类学研究的强调后来被他的学生们发展,也深刻影响了格尔茨。

在很多人类学者看来,马林诺夫斯基是现代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革命者和奠基人。但是,通过马力罗的梳理,我们看到事实上就如理论发展一样,对于研究方法的更新是一代一代人在不同的地点逐渐探索、实践的结果。例如,赫赫有名的“托雷斯海峡考察”和“托雷斯海峡第二次考察”已开创了田野调查的先河。在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哈登(A. C. Haddon)“不只是收集资料,而是要耐心地从当地人那里弄清楚资料中蕴含的意义”的主张已是人类学开始深度研究的

①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32页。

② [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33页。

③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40页。

开始。里弗斯(W. H. R. Rivers)在考察中发展的“谱系法”有很多关于方法论的主张已经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参与观察法十分相似。^①

二、从“深度研究”到“深描”

马林诺夫斯基的重要性在于他将田野调查的方法完善化且很好地应用于理论创新。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田野调查的时间要长,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长时间住在一个地方,研究者才能融入被研究的人群,与当地人建立一种自然的关系。他的研究方法界定了研究范围,即一个有清晰边界的社区或人群。马林诺夫斯基将田野中收集的各种资料进行联系,并发展出功能论。从此,人类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类学家开始从内部展示单一的文化,并试图解释各个文化之间的关系。^②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将田野调查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但是这一研究方法并没有走出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论信条:研究对象可以被经验地、直接地观察到。由马林诺夫斯基完善的田野调查方法成为人类学的成年礼并影响了几代人,但是这一方法在他的私人日记出版时备受质疑。很多人都批判马林诺夫斯基事实上在自欺欺人地建构一个不存在的神话。马力罗却在书中创造性地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经历反映出一种深刻的人类学迷茫”,即就算人类学家与当地人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完全的移情也是不可能的。马力罗介绍了在对比马林诺夫斯基的私人日记和他的著作时一些学者做出的理性反应:这正好反映了人类学最值得骄傲也最值得反思的方法:直接参与和科学观察之间的难以平衡。^③马力罗引述了本杰明·保罗(B. Paul)的观点,“参与意味着情感的卷入,观察则需要保持距离”,认为参与和观察之间不仅难以平衡,而且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存在极大的冲突。马力罗进一步指出,事实上,马林诺夫斯基大部分的资料都是通过访谈——这一其本人看来非常差劲的方式——而获得。在这一章节中,马力罗还讨论了另一个阻碍研究者完全参与但被长期忽视的因素——社会地位,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作为英国殖民统治者中的一员,其与当地人的平等交流几乎是不能想象的。除了罗列马林诺夫斯基在欧洲和美国的学术遗产,马力罗在这一章中特别强调了其在中国的影响,即费孝通的博士研究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复杂社会的例子。^④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的出版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另一次革命。他对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讨论和反思再一次成为推动人类学方法论创新和理论发展的动力。马力罗认为格尔茨最主要的贡献有三点:第一是否定科学研究方法,第二是将对知识科学性的反思融入对当代社会不同文化结构和文化关系的分析之中,第三是思考民族志经验和文本写作的关系。格尔茨吸收了现象学、符号学、文学批评等思想,发展出人类学的深描方法。在深描中,格尔茨认为研究者否认自身文化和背景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理解研究对象,不需要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移情。相反,他强调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差异应该得到肯定,且它恰恰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马力罗认为,格尔茨深入思考人类学家的阐释和报道人的阐释之间的关系,^⑤将“前理

①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43页。

②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60页。

③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64页。

④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72页。

⑤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96页。

解”作为二者之所以可以交流的前提,提出人类学家和报道人之间的阐释互动,都是其“深描”对人类学方法论的贡献。人类学家的身份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类学家必须对自身所处的位置有清晰的认识,这样他者才会有意义”。^①同时,研究者也应该清醒认识到当地人并不是简单地将脑海中的想法陈述出来,当地人的想法应该是与人类学家互动的结果。马力罗认为格尔茨的方法论贡献同时也给人类学的研究提出挑战,即如何在当地人的观点和人类学者自身的观点中寻找平衡。马力罗认为在方法论更深的层面,格尔茨将“个人因素与学科因素之间微妙的交织推至前台”,^②而且对这种交织的不断反思和观察,使人类学由“参与观察”走向“对参与的观察”。同时,由于格尔茨强调民族志经验和文本写作之间的关系,人类学的研究从研究者/被研究者的二重关系扩展到加入读者、已有文本以及田野中所获其他资料的多维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人类学家通过书写将人的经验变成人类学的经验。因而,人类学家在根本意义上成为作者。

三、后现代民族志和在场的身体

格尔茨之后,人类学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在此过程中,全球性实践和地方性实践的互相融合使得民族志呈现出不稳定的形态。人类学研究也从简单的前现代社会解放出来,开始大范围关注复杂社会。民族志不再简单地分为内部和外部。^③在方法上,实验民族志占主导。在理论上是对很多理论和假设的质疑,即对文化、共同体、身份、族群、种族及其他人类学基本理念的调整和质疑。在此基础上,人类学家也思考自身的身份。人类学家被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理解为多元文化和多点归属的结合体。因此,跨国的,世界主义人类学的形成也是人类学家自身身份的体现。后现代思潮对主体流动性、多点性、场景性和变化无常的理解,促成了另一个人类学方法论成果,即田野研究方法的“去位置化”(delocalize)。^④

阐释学的转向在格尔茨时代及其之后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上展开,其成果包括沉思式、对话式和多声部的民族志。结合作者自身的研究和理论特长,马力罗认为对阐释学的批判发展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即身体在民族志研究中的重要性。马力罗将这一研究方法称为“anthropology from the body”即“身本人类学”。或许是与其本人的研究特长相关,他对这部分的论述尤为精彩。他首先区分了身体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body)和身本人类学之间的差异。身体人类学是对身体及其文化性的研究,身本人类学除了继承身体人类学的关注点之外,还将研究者在田野中的切身体验纳入考察范围。换句话说,身体人类学关注被研究者的身体及其文化性,身本人类学还关注研究者自身的身体及其文化性。身本人类学在方法论上最核心的革新是将人类学的研究从语言转移到经验和实践,其哲学基础是“经验的共享不发生在语言中,而是通过身体发生在行为中”。^⑤马力罗详细阐述了托马斯·卡索达斯(T. J. Csordas)如何结合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理解理论和布迪厄(Pierre

①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97页。

②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99页。

③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130—131页。

④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132页。

⑤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133页。

Bourdieu)的实践理论而发展出“文化过程根置于身体间的生活经验”这一观点。^①同时,马力罗也对身本人类学的研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身本人类学首先“没能对身体化知识的性质做认识论上的审视”,^②即身本人类学没有回答关于身体的知识能否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问题。其次,就算通过身体的模仿理解他者,这种知识仅仅是身体上的,人类学的研究最终要诉诸文字,如果身体经验不能被转化为文字,则这种方法仅仅是“有破无立”,因而身本人类学也没有解决“参与的主观性”和“观察的客观性”问题。

四、小 结

《民族学与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精彩地呈现了人类学方法和理论之间的互构关系。理论的革新离不开对方法论的反思,而每一次方法论的革新都会带来理论的推进。马力罗将其称为学科发展中“永不知足”的探究。读者不禁会追问,这样一种不知足是否也暗示了理论解释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论研究》并非是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梳理,而是建立在作者深厚哲学素养基础上的一种质疑。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质疑上,还提供了他的质疑的哲学和人类学学科历史根源。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写作不能被孤立于调查之外,应该被当成民族志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将其展开。书中正文的部分论述也略显简短,在阅读中总是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瑕不掩瑜,这本书尤其适合于人类学硕士和博士生研究生,以及研究人类学方法论、人类学史的学者阅读。书中最后一章为对身体及其相关问题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哲学和方法论参考。基于其出色的英文和深厚的人类学知识,本书译者吴晓刚博士将这本思辨性极强的书准确、专业且富有文采地进行了翻译。相信这本书将启发更多对人类学感兴趣或正在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中文学者。

(作者马祯,女,德国马克斯·普朗特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研究员。地址:Hermann-Föge-Weg 11,37073 Göttingen,Germany)

[责任编辑 刘海涛]

①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134页。

② 参见[意]马力罗著、吴孝刚译:《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第140页。